

CHINA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

中国新闻 传播研究

2017 (下)

高晓虹◎主编

刘宏

赵淑萍

曾祥敏◎

副主编

新全球化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重建和路径重构

史安斌 王沛楠

反腐败传播的中国模式与基层实践

——以河北邱县反腐漫画调查为例

姬德强

互联网听觉空间：形成、特征与现状

隋欣

ICANN@十字路口：

IANA职能管理权移交纪实

徐培喜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CHINA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

中国新闻
传播研究

2017 (下)

高晓虹◎主编
刘宏 赵淑萍 曾祥敏◎副主编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17.下 / 高晓虹主编.--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4
ISBN 978-7-5657-2467-1

I.①中… II.①高… III.①新闻学—传播学—研究—中国—2017 IV.①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53514 号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 2017(下)
ZHONGGUO XINWEN CHUANBO YANJIU 2017(XIA)

主 编	高晓虹
副 主 编	刘 宏 赵淑萍 曾祥敏
策划编辑	王雁来
责任编辑	王雁来
封面设计	拓美设计
责任印制	阳金洲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0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98mm×1092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2467-1/G·2467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编委会名单

- 特邀编委：**王君超（清华大学）、支庭荣（暨南大学）、石长顺（华中科技大学）
（按姓氏笔画排序）刘鹏（《新闻记者》杂志社）、苏宏元（华南理工大学）、李喜根（香港城市大学）
张涛甫（复旦大学）、陆绍阳（北京大学）、陈富清（《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杂志社）
罗以澄（武汉大学）、周勇（中国人民大学）、周树华（美国阿拉巴马大学）
胡智锋（北京师范大学）、胡翼青（南京大学）、隋岩（中国传媒大学）
董庆文（美国太平洋大学）
- 主 编：**高晓虹
- 副 主 编：**刘宏、赵淑萍、曾祥敏
- 编 委 会：**何苏六、王晓红、吴敏苏、崔林、顾洁、叶明睿、徐培喜、陈欣钢、涂凌波、赵希婧、程素琴
- 编辑部主任：**赵淑萍
- 本期执行编委：**崔林、顾洁、叶明睿

目录 >>>> CONTENTS

特 稿

- 新全球化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重建和路径重构 史安斌 王沛楠/ 3

政治传播

- 反腐败传播的中国模式与基层实践
——以河北邱县反腐漫画调查为例 姬德强/ 21
- 不成熟的“商品化”、不完整的“结构化”
——莫斯可“三化”理论框架下日本三个华文微信公众号内容研究 刘康杰/ 31

视听传播

- 互联网听觉空间:形成、特征与现状 隋 欣/ 49
- 论纪录片再现风险的知识政治 郭小平 彭 媛/ 62
- 中国电影生产主体竞争格局的转变
——基于 2004—2016 年电影制片机构的社会网络分析 江 虹 贺 婷/ 73
- How Does the BBC Portray China?
—A Study of BBC Documentaries on China from 2007 to 2016 and
Its Implications Kodelia Chatfield Xiaoling Zhang/ 86

青年视点

- ICANN@十字路口:IANA 职能管理权移交纪实 徐培喜/ 123
- 情绪传播视角下的网络群体极化研究 付晓光 宋子夜/ 142

国外经由社交媒介进行健康传播研究的知识图谱

——基于 Citespace 的计量分析

程 颢 / 152

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的路径探索与理念创新

李艾珂 / 176

融媒体实验室:新闻传播实践教学的创新与进路

郑志亮 吴 昊 / 186

行政发布中的框架建构:北京大兴“11·18”火灾事故舆情视角演变引发的思考

郑丹琪 / 196

盘点与综述

人工智能对中国新闻传播业的重构

——2017 年中国媒介盘点

栾轶玫 刘 宏 / 209

新媒体转型与广播电视发展

——新媒体转型发展高峰论坛暨中国广播电视学

与新媒体研究分会 2017 年会议综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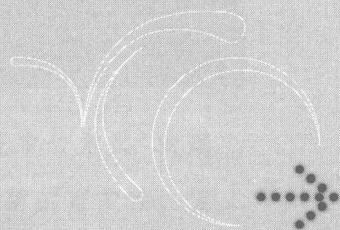
秦瑜明 周晓萌 / 219

书 评

新媒体“新”在何处

——评泰瑞·弗卢(Terry Flew)的《新媒体导论》第四版

吴明华 / 227



特稿

新全球化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重建和路径重构

史安斌 王沛楠

新全球化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重建和路径重构

Provincializ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Practical Re-orientation

◎ 史安斌 王沛楠

Shi Anbin Wang Peinan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解构“欧美中心主义”的潮流,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也在“去西方化”的语境下探索理论重建的可能性。但时至今日,政治传播仍然是“西方中心论”占据垄断地位的最后一块“飞地”。2016年全球进入“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的时代背景下,政治传播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解释力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本文通过梳理政治传播学的理论演进与发展脉络,以“行省化”视域作为切入点探讨“新全球化”时代理论创新的可能性,寻求超越“西方化—去西方化”二元对立的现实路径,并分析中国政治传播学界在全球范围的“行省化”探索中应当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政治传播,传播理论,去西方化,行省化,新全球化

Abstrac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s regarded as the field with deep-seated Euro-America-centrism. However, in the “post-west”, “post-order” and “post-truth” era, the Euro-centric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confronts drastic challenges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xis.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follow the route of “provincializing Europe” to expedite the “paradigm revolution” fo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age of neo-globalization and to engage Chinese academia in transcending from the age-old binary oppositions such as “center-periphery” and “westernizing-de-westernizing” both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practical re-orientation.

Keywor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de-westernizing, provincializing, neo-globalization

虽然对政治传播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时代,但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宣传战才推动着规范化(normative)的政治传播研究逐步形成,并推动政治传播研究成为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1973 年,国际传播学会(ICA)成立了政治传播分会,并在次年出版了第一本专刊《政治传播评论》(即目前本领域的重要学术期刊《政治传播》的前身),从而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建制化发展。

伴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曾经占据社会科学研究主导地位的“欧美中心主义”(Euro-America-centrism)开始受到冲击,传播学研究也开始在“去西方化”的语境下探索理论发展的进路。但唯独在政治传播领域,“西方中心论”仍然处于牢不可破的地位。政治传播研究的“西方中心”视野成为影响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阻碍。但 2016 年以来国际社会和政治的一系列变化,使得全球政治传播的实践和研究都开始出现变局。

2016 年以来西方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标志着当今世界进入“后西方”“后秩序”时代,以“启蒙”“现代性”为核心的“欧洲文化想象”(European cultural imaginary)和 1945 年以来建立起来的“美国秩序”(Pax American)正一步步逼近内爆和崩塌的边缘。“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思潮席卷全球,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人物开始采取收缩性的全球战略,放弃了“全球领导者”的角色,这使得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历史节点。

面对“逆全球化”思潮的侵袭,世界迫切地需要新的驱动力量推动全球化。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豪情满怀地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引发了全球媒体和舆论的高度关注。特别是他在报告中强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处在变局与迷局中的全球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在这种“新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将进一步增大,这将使得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和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本文通过梳理政治传播学的理论演进与发展脉络,以“行省化”视域作为切入点探讨“新全球化”时代理论创新的可能性,寻求超越“西方化—去西方化”二元对立的现实路径,并分析中国政治传播学界在全球范围的“行省化”探索中应当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一、政治传播的演进脉络与“西方中心”视角的形成

(一) 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溯源与演进脉络

从学术溯源的角度来看,政治传播学可以说是传播学的“元学科”(meta-discipline)。政治与传播的关系是传播学研究亘古不变的“母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公共演说被视为早期民主实践的基础和政治传播的首要途径。^①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提出,演讲者可以在公共演说中通过“人品诉求”“情感诉求”“理性诉求”的技巧提升劝服的效果。他的这本著作也因此被视作政治传播的滥觞。同样,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也有对于政治修辞和公共演说的讨论。这些经典都成为西方政治传播理论建构的基础。时至今日,修辞学——更为确切的命名应是“语义学”——不仅依然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也是传播学领域中历史最悠久的亚学科。

但作为一门学科,政治传播学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真正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值得强调的是,政治传播研究的兴盛与两次世界大战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此期间,各参战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战”“舆论战”“心理战”,使政治传播的效果成为左右战事走向和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之一。霍夫兰、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等先驱学者对宣传、选举等议题所展开的相关研究不仅为传播学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奠定了政治传播研究在传播学科地图上的核心地位。^②从“耶鲁学派”有关战时广播和电影的“说服研究”到拉扎斯菲尔德等人进行有关选民投票意向的“伊里调查”,再到麦库姆斯等人验证议程设置理论的“教堂山镇研究”,传播研究的“主导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政治传播来展开的。

尽管传播与政治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对于“政治传播”这一概念的定义和研究范畴在学界始终存在争议。查菲曾以简洁的笔触概括政治传播研究的是“传播在政治进程中的角色”^③。但类似这样过于宽泛的定义并不利于政治传播研究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尼莫与桑德斯指出,政治传播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政治机构和公民参与投票的互

① OBER, JOSIAH. Power and oratory in democratic Athens: Demosthenes 21, against Meidias [M]. Persuasion: Greek rhetoric in action, 1994: 85-108.

② KAID, LYNDIA LEE,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M]. London: Routledge, 2004: 3.

③ CHAFFEE, STEVEN H.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ssues and strategies for research[M].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75: 15.

动关系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动员与影响力传播。^①这个概念虽然更为细致地阐述了政治传播所研究的内容,但却隐含了“代议制民主”是政治传播研究的前置性预设这一观点。因为如果不存在“政治机构和公民参与投票的互动”,政治传播的研究就无从谈起。由此可见,政治传播研究在其理论框架形成的初始期,就已经处于“西方中心论”的强大影响之下。

熊彼特提出的“选举中心论”,对于当前西方政治理论以及政治传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熊彼特看来,只有自由选举才能被纳入到民主国家的考量中。亨廷顿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流政治学都以普选作为界定是否民主的尺度,民主被看作构建权威并使其负责的一种手段。”^②佩特曼也强调:“时至今日,选举竞争实际上构成了国际社会判断一个政体是否是民主政体的实际准绳,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民主标准。”^③这些论述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学者对于政治传播研究理论关切的界定。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政治传播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对选举制度发展史的梳理与分析。“议程设置”“既有倾向假说”等大批经典的传播理论都是最早针对美国的选举活动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并在其他多党制民主国家进行了重复性检验。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政治传播研究是具有“准入资格”的。只有效仿西方实行多党制和自由选举且拥有“独立”媒体的国家,才有可能进入政治传播的研究领域,并与国际学术界展开对话。那些选择不同政治制度和运作方式的国家很自然地被打入“另册”,游走于政治传播研究的边缘地带。追溯现代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起源,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视角。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相呼应,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传播研究也逐渐形成了一套“中心—半边缘—边缘”的权力架构。

(二)政治传播研究领域的“欧美中心主义”倾向

由于研究对象与政治密切相关,政治传播长久以来都是传播学界“西方中心论”(或曰“欧美中心主义”)积淀最深厚的一个领域。西方学者在传播研究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随处安放的学理自尊”,认为其研究应该具有普遍意义,并试图将无法被纳入这种框架的研究边缘化为“特殊”或“例外”。^④由此形成了当前政治传播研究的一

① NIMMO, DAN D, KEITH R.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M].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81: 12.

②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5.

③ 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M].陈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5.

④ GROSFOGUEL, RAMÓN. The epistemic decolonial turn: beyond political-economy paradigms[J]. Cultural studies, 2007, 21(2-3): 211-223.

个奇特现象:华裔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印度裔学者研究印度问题,欧美国家的“白人学者”研究全球问题。在这样的政治传播研究环境下,处于“半边缘”的国家,只能依附于西方学者的理论发现进行重复验证;而像中国这样被西方视为“例外”的国家,则被完全排斥于政治传播的话语体系之外。

但如果追溯政治传播的学理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它在本质上是基于欧美国家的本土经验被泛化而成了具有全球意义的理论范式。^① 政治传播研究必须以工具理性、个人自由和权利意识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条件而展开,^②但由于存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语境,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学者在探索本土政治传播实践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与西方学者会有很大的差异,基于欧美国家本土经验的假设能否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前提,这一点是值得认真反思的。^③

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深入、亚洲经济的崛起和全球媒介研究的发展,西方以外的国家日益认识到需要建构替代性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盎格鲁—美利坚”范式之外的本土经验。^④ 为此,詹姆斯·卡伦(James Curran)和朴明金(Myung-Jin Park)编辑了《去西方化的媒介研究》(*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2000)。这本论文集汇聚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围绕如何建构本土性的传播研究展开讨论的研究成果。《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杂志也曾组织以“去西方化的传播研究”为主题的专刊。对“欧美中心主义”的解构和颠覆一时间成为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一股“去西方化”的浪潮。作为这股浪潮的延续,汪琪(Georgette Wang)编辑了《去西方化的传播研究》(*De-Westerniz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3)。这本论文集将“去西方化”的思路由传媒拓展至更为宽泛的传播、沟通和文化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传播学界兴起的这股解构“欧美中心主义”的潮流过度聚焦于个人化的身份政治和文化体验,缺乏对政治经济体系等宏观框架的剖析,因而对政治传播研究的影响甚微。上述两本在传播学界具有风向标意义的论文集均没有深入触及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这充分表明,“历史终结论”仍然是政治传播研究或明或暗的预设前提。这种思维定式直到西方政坛“黑天鹅”频出的2016年才开始出现松

① MIIKE, YOSHITAKA. An Asiacentric reflection on Eurocentric bias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J].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2007, 74(2): 272-278.

② TU WEI-MING. Global community as lived reality: exploring spiritual resource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J].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progress*, 1996, 1(1): 39-51.

③ WAISBORD, SILVIO, MELLADO C. De-westernizing communication studies: a reassessment [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4, 24(4): 361-372.

④ PARK, MYUNG-JIN, CURRAN J, eds.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M]. London: Routledge, 2000: 46.

动的迹象。

从当下西方政治传播生态的变局来看,“后真相”“另类空间”等新型传播生态的兴盛充分表明,经典政治传播理论构建的理想化的“议程设置”“公共领域”等概念框架已不复存在,民众和媒体正逐步偏离传统的规范和准则,越来越多的民众对民主的核心价值丧失信心并开始支持威权统治,民主的根基面临瓦解,西方社会在步入“后真相”时代的同时也正走进克罗奇笔下的“后民主”(post-democracy)时代。^① 时代的巨变需要我们及时进行理论的扬弃。正如兰斯·班尼特(Lance Bennett)在2017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所言,政治传播领域即将面临一场“范式革命”。网络空间的极化、公共领域的瓦解,以及另类空间的兴盛需要我们重新评估包括“议程设置”“公共领域”等在内的经典理论对当代西方政治传播现象的解释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传播研究中的“去西方化”尝试才刚刚起步,长期以来主宰政治传播研究的“中心—一半边缘—边缘”的权力架构有望被彻底颠覆和重新改写。

二、新全球化时代政治传播研究面临的挑战

(一)“后西方”背景下政治传播的理论和实践困局

经典政治传播理论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在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共同体内,绝大多数公民处于共同、一致的公共领域。^② 这种带有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的价值观在政治传播学科初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经典政治传播理论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但2016年以来,伴随着英国公投决定脱欧、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逆袭”取胜、意大利修宪公投被否决、法德两国大选中“右翼”势力支持率大涨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出现,整个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共识发生了颠覆性转变,从而使政治传播理论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出现了内爆和崩塌的趋向。

一方面,欧美传统主流媒体失去了全面反映各阶层民众意愿的能力。美国大选期间,几乎所有的传统主流媒体都选择为希拉里背书,主要民调机构都预测她会成功当选。《纽约时报》总编辑迪恩·巴奎特(Dean Baquet)事后反思时指出,主流媒体的记者身居纽约、华盛顿、洛杉矶等大都市,无法深入体察基层的社情民意和舆论动向,这导致媒体与草根阶层和中西部“铁锈带”选民完全脱节——而后者正是支持特朗普的

① CROUCH, COLIN. Post-democracy[M]. Cambridge: Polity, 2004: 1-15.

② 史安斌,杨云康.后真相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重建和路径重构[J].国际新闻界,2017(9):54-70.

主力军,引发了媒体对民意的严重误判。

在民主制度中,大众媒体承担着提供信息、保障民众知情权的重要责任,从而保障民主制度建立在充分知情和信息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而在近几年的重要政治事件中,欧美主流媒体在这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刻意迎合部分选民的诉求,跟风炒作社交媒体设置的议题,进而无力弥合社群分歧,更谈不上凝聚构建公共领域的社会共识,致使“知情的民主”演变成了“盲情的媒主”。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既有的政治传播理论自然无法解释为何主流媒体失去了对大众的影响力,也无法解释主流民调为何会错误地预测政情变化和民意走向。

另一方面,充斥于社交平台的“后真相”加剧了新闻舆论场的极化效应。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杨采·本克勒(Yochai Benkler)等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追踪了超过125万篇网络新闻报道的传播路径。通过分析这些报道在社交媒体上被转发的情况,研究者发现以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为代表的右翼新闻网站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信息体系内海量传播“误导性信息”(disinformation),主导了整个大选的议题走向和舆论生态。

对“假新闻”现象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受众选择转发这些虚假新闻并不完全是因为缺乏了解信息的渠道,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抗争的工具,以宣泄对社会现状的不满。^①牛津词典选择“后真相”作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这反映了在社交媒体主导的政治传播中出现的一个新的趋向——情感的“聚合效应”超越客观事实的传播,成为影响公众认知的主要因素。在主流媒体逐渐“失语”的情况下,受众开始选择各种传递极端政治观点的“另类空间”去获取信息,致使整个社会被情感和偏见切割成碎片化的“部落”,从而加剧了公共领域的进一步瓦解,^②继而动摇了民主政治赖以生存的根基。在此背景下,基于现代主义的经典政治传播理论已不能充分解释带有后现代表征的各类变化和演进,一场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展开的“范式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二)政治传播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倾向

尽管西方国家的政治传播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重重危机,但处在学术图谱半边缘和边缘地带的学者却未能跳出固有的窠臼来寻求“突围”。虽然在20世纪末和本世纪

① 史安斌,王沛楠.作为社会抗争的假新闻——美国大选假新闻现象的阐释路径与生成机制[J].新闻记者,2017(6):4-12.

② 史安斌,杨云康.后真相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重建和路径重构[J].国际新闻界,2017(9):54-70.

初,传播学界掀起了一股“去西方化”的潮流,但对政治传播研究的影响较为有限。具体而言,政治传播研究中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仍然十分强大和牢固。

后殖民主义在政治传播研究领域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学术生产的方式上,即由西方国家的学者生产理论,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对其进行验证,进而在异质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推广这些理论。以经典的议程设置理论为例,该理论在美国问世 50 年来,各国的研究者在不同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反复验证其有效性,并进行相应的修正。每当“议程设置理论”(AST)在原产地(主要是美国)出现更新迭代,即号称“AST2.0 版”的“议程建构理论”(ABT)和“AST3.0 版”的“网络议程设置”理论(NAS),其他地区的研究者便会立即跟进并展开基于本土语境的重复性验证。这就使得来自非西方国家的学者普遍追求“跨境”(translocal)——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本土”(local)——研究,力图通过跨越不同的本土语境进行重复性的检验,而不愿基于本土经验和实践进行原创性的理论建构。^① 这种“跨境”往往会导致李金铨所说的“搬一个貌似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命题或理论,在各国反复谋求经验上的印证”的“内眷化陷阱”^②。即使是对西方理论的“本土化”或“再语境化”,也难以摆脱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所说的“理论旅行”的殖民主义话语模式。

毋庸置疑,在以西方为中心的政治传播学术生产机制中,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被视作学术语境中的“他者”,成为西方学术理论证实或者证伪的对象。处于这张学术版图最边缘地带的非洲就是典型的例子。在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民主化浪潮之后,有关非洲政治传播的研究才开始日渐兴起,而且都是基于自由民主的“规范化”视角来展开的。以此为衡量,非洲在民主政治实践中的不充分和不平衡使得该地区成了政治传播研究的“负面典型”,扮演着“失败国家(或体制)”的角色。^③ 非洲本土学者则只能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学界的风向变化,难以对其政治传播现实状况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开掘。

近期在西方媒体和学界颇具影响的“中国谜题论”,也是遵循了这样一种后殖民主义的套路。此论由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首先提出。他认为,中国一直是西方人眼中最大的“谜题”,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经济成就与政治制度

① HAFEZ, KAL. The methodology trap—why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are not really international[J]. Communications—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3, 38(3): 323-329.

② 李金铨. 传播研究的时空脉络[J]. 开放时代, 2017(3): 209-233.

③ WILLEMS, WENDY. Provincializing hegemonic historie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oward a genealogy of epistemic resistance in Africa[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4, 24(4): 415-434.

之间的巨大落差。^①

从实质上说,沃尔夫的“中国谜题论”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中国例外论”(中国是一切例外之例外)的延续和衍生。如果说黑格尔强调的是中国与西方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那么沃尔夫则把这种差异引入了政治制度、治理模式和主流价值观,即“政治文明”的层面。无论是“谜题论”还是“例外论”都是西方学术道统无法解释中国政治实践之后寻找的一种“权宜之计”。这也充分说明,在“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的当下,政治传播研究已经不能再靠带有后殖民主义色彩的“套路”包打天下了。

由此可见,经典政治传播理论的解释力在当前的西方社会备受质疑。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政治传播领域,来自非西方国家的领军学者——其中大多数都在欧美知名学府受过学术训练——难以摆脱后殖民主义思维定式的羁绊,也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在全球政治体系、权力格局和传播生态发生剧烈震荡的背景下,寻求适应“他国崛起”(rise of the rest)语境的理论重构和实践再造,无疑也是重绘政治传播学术版图的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三、超越二元对立论:政治传播研究的行省化路径

(一)从“去西方化”到“行省化”的学术转向

20世纪80年代以降,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传播学界也加入了学术界以“去西方化”为主线的理论反思和路径重构的队伍当中。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在对欧美中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倾向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同时,其学术路径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为了反对西方霸权,建构了某种封闭的“非西方”模式,并且以“非西方”的研究路径占据道德和话语的制高点,形成了“西方”与“非西方”研究路径之间尖锐的二元对立。这种“去西方化”的思路一方面将“西方”高度同质化,抹杀了在西方国家内部存在的政治传播实践与研究路径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将“非西方”语境下的传播学研究“他者化”,否认了全球政治、社会与媒体生态仍然处于“西方路灯光影”之中的现实状况。如果全然拒斥西方传播研究的话语体系与学术成果,试图在一种“真空”的本土语境下建构“另类空间”或“替代性话语体系”,同样会陷入形而上的陷阱中。这一点对政

^① 沃尔夫.西方眼中最大的“中国谜题”[EB/OL].(2017-06-08)[2017-12-01].<http://next.ftchinese.com/story/001072839?page=5>.